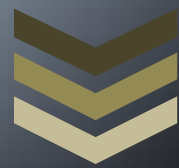


歷史專論七



洪楊革命與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



作者夏玉泉

2021年2月21日

作者簡介：夏玉泉，1989年澳門東亞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及1996年亞洲（澳門）國際公開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畢業生。

目錄

1. 前言.....	1
2. 理論架構.....	1
3. 洪楊革命之理論.....	3
4. 辛亥革命之理論.....	6
5. 洪楊與孫中山兩革命之意義.....	10
6. 結論.....	11

1. 前言

清朝中葉至滅亡這百多年間，經歷了兩次大型漢人反滿族統治的革命，一是洪秀全（1814-1864）及楊秀清（1823-1856）等領導的「太平天國運動」；另一是孫中山（1866-1925）領導的「辛亥革命」。前者從道光末年經咸豐至同治初年，前後歷時 14 載（1851-1864），最後以失敗告終；後者從「甲午戰爭」後至「武昌起義」，前後歷時 18 載（1894-1911），最終成功推翻滿清。本文並不打算分析兩次革命一成一敗的原因，因為從革命性質、理論基礎、組成分子、及對文化的態度，已經明顯地知道「洪楊革命」終歸失敗。這裡將重點論述兩者的歷史意義。

2. 理論架構

研究歷史事件，每每分析它的起因、經過、及結果，嚴謹一點者會細說它的影響。歷史事件的影響可從短期及長期分析，短期分析乃指事件對下一相關歷史事件發生的作用及影響程度；長期分析則將視線放遠，把所研究的歷史事件之時間上推及下移，分析它承接那些事件，及對後來那些事件有影響。稱為歷史的「承先啟後分析」，這樣便容易對歷史發展有一清晰的脈絡。

人類為「萬物之靈」，其原因是人懂得求變及創新。人類每代的繼承者，往往除了承傳前人的思想外，亦會從自己的思維，變化出

另一種與舊觀念相近的新思想，如此生生不息地延續下去，人類才會超越其他動物領導世界。這種發展過程，在歷史洪流中完全可以發現。

研究洪楊革命與「辛亥革命」的歷史意義，我們可從上述兩方面加以討論。首先，「洪楊革命」是上承清初明末遺民抗清的革命運動，可說是天地會或白蓮教等民族革命組織的延續，雖然失敗但影響後來孫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；孫中山反清的思潮源自少年時在故鄉聞「太平天國」遺老講洪、楊故事後生成，足證孫中山革命乃繼承「洪楊革命」，而且他的革命思想不因「辛亥革命」成功而結束，它還啟發民初「五四運動」（1919）的發生，以至日後共產革命也延續部分孫中山的思想。

其次，如前所述推動洪楊革命與「辛亥革命」的民族革命思想乃一脈相承，然而彼此其後又各自發展一些更能適合時宜的新思維。天地會或白蓮教革命只揭櫫「民族主義」，以「反清復明」鼓動漢人驅逐滿人為目的；洪、楊的「太平天國運動」，在民族革命以外，還加上平均地權、公有財產、及男女平等的社會改革，是在「民生主義」方面的一大進展；到了孫中山，他在「民族主義」及「民生主義」基礎上，添加了「民權主義」思想，強調自由、民主、及博愛。所以歷史學者蕭一山（1902-1978）說：「從歷史上看，天地會是一民主義，

太平天國是二民主義，國民革命是三民主義」。

3. 洪楊革命之理論

有清一代，民族革命思潮隨着滿洲人主政開始醞釀及發展，原因有二：一、滿清以少數民族竟將大明滅掉入主中原，在漢人心中造成很大的不安，對排滿思潮有着激盪作用；二、滿洲人入關後，實施高壓政策屠殺漢人，「揚州十日」、「嘉定三屠」等事件加深了漢、滿民族的仇恨。雖然清初漢人的抗清運動均被戕平，但反清意識並沒有完全絕滅，民間依然存在許多稱為「會黨」或「教黨」的反清組織，以天地會及白蓮教為代表，它們雖以「反清復明」為聚集口號，實質乃民族革命運動。

有指「洪楊革命」只屬一場民變，實因廣西天災糧食歉收，構成一股對抗政權的力量，其立場並非針對漢人反抗滿清政權而起的革命。因為太平軍在紫荊山（今廣西省桂平市南靖縣）潛伏時期的一切宣傳活動，都只有上帝會，絲毫沒有種族意識；起事後，他們所發佈的文告，凡屬宣傳上帝會的，都是通俗的白話文、凡是涉及種族意識，都是文言文。白話文是給一般群眾讀的，向群眾只談宗教；文言文是給士大夫讀的，種族主義只向知識份子宣傳。所以所謂種族主義者，僅是號召知識份子加入他們陣形的策略（李定一，《中國近代史》）。

然而洪秀全於金田（今廣西貴港市桂平市）起義前宣揚上帝會

時，在文字上雖未直接反清，言論間則予痛詆。當論及時事時慷慨激昂，恨中國無人，「以十八省之大，受制於滿洲三省，以五萬萬兆之華人，受制於數百萬之韃虜，誠足為恥為惡之甚者。兼之每年化中國人之金錢千萬為煙土，收華民之脂膏數百萬為花粉。一年如是，年年如是，至今二百年，中國之民，富者安得不貧，貧者安能守法」（郭廷以，《近代中國史綱上冊》）。由此可見洪秀全在革命前已經存在排滿思想，他是從社會貧困的環境下領悟出滿洲人統治的無能，而牽起種族抗爭之理念。

其次，太平軍起義不久，許多天地會會員與武裝部隊都來參加。天地會首領洪大全（1823-1852）率領全部部隊投靠，勢力大盛，而且洪大全更成為「太平天國」開國的重要領導人物（李旭飛，《洪楊革命與國父革命之比較研究》）。縱使如李定一所言，太平軍提出種族意識只是作為興軍理由，洪、楊在本質上並不是種族主義者屬正確，但起義後太平軍的本質已經滲透了天地會「反清復明」的排滿意識，因此不可不承認「太平天國運動」是一場民族革命運動。而且蕭一山也說：「洪秀全早年出身於天地會……他的民族革命思想……都是由天地會而來，他是一個繼承者」（蕭一山，《清代通史》）。

「洪楊革命」繼承天地會排滿反清之思想外，經濟方面還孕育出平均地權及共有資產的理念。清自乾隆年初，人口開始迅速增長，

從 1741 至 1841 年的百年間，人口從 1.43 億增加至 4.13 億，增加約 3 倍；耕地面積則從 1766 年的 7.41 百萬頃減至 1823 年的 7.38 百萬頃，在此情況下，土地不足以分配，土地不能與人口同時增加，百姓若無別種生活方法則日貧，貧者則由借債而至賣田，於是助成商賈富豪的兼併，漸至土地集中於少數富豪地主之手，造成貧富懸殊、失業等現象（李劍農，《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冊》）。

自嘉慶（1796-1820）以來，從英國輸入之鴉片大增，導致白銀大量外流，造成「銀貴錢賤」。一般百姓的生計日見艱難：因為民間收支多以錢計，而完糧和交易、工資的償付，全以錢節銀，使用銅錢交付變相使收入減少。時人吳嘉賓（1803-1864）上喻的《銀錢並用議》說：「銀每兩值錢二千，傭一年工，只易五兩銀，傭值歲不過十千」（黃大受，《中國近代史上冊》）。按每人每年至少吃米 3 石，當時平均米價每石約 10 兩 8 石計（朱伯康 施正康，《中國經濟史下冊》），傭工 1 年在食米方面的支出已經佔收入的 75%。

洪、楊鑒於社會貧富不均及百姓生活艱苦等民生問題嚴重，當太平軍定都天京（今江蘇省南京）後，便公佈「天朝田畝制度」，重要者有三：一、土地公有，依人口平均分配，辦法是將田的肥沃程度分為九等，按每家人口多寡，不分男女將沃與瘠的田平均分配；二、餘糧餘財歸公，由公家支配運用，方法是凡收成時，每家除所需要的

穀物外，餘數全歸國庫，天下人人不存私產，大家處處平均，百姓就能飽暖；三、施行徵兵制，百姓由國家負責供養，每家出一人為兵，遇戰爭時首領統率之為兵，無事則為農，其餘鰥寡孤獨廢疾者免役，皆頒國庫以養，如一家有婚娶彌月喜事，給錢一千，穀一百斤。這是一個公有共享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，如能貫徹執行，實能打破當時的不平等社會。

有謂洪、楊革命始終沒有全盤實行過上述所有措施，至少土地依人口平均分配一事，徒為紙上的空文，因為太平軍所佔領的只有各都會城鎮，縱使有些鄉區地方，也在他們的政令管轄之下，但當軍事擾攘之時，人民心理對太平軍尚懷反感，這制度實無施行的可能（李劍農，《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冊》）。但無論如何，這些政令背後的理念是針對時弊而生，況且清初「反清復明」之士以至天地會革命份子，都缺乏這種注重民生的變革，即使沒有實行，但它對日後孫中山革命理論的影響是有一定作用。

4. 辛亥革命之理論

「辛亥革命」是孫中山革命運動中一場關鍵性的起義行動，由於這場起義行動成功，促成了孫中山推翻滿清政權的整個民族革命運動之成功。因此本文以「辛亥革命」一詞來表示孫中山整個革命運動。據孫中山所說，他立志顛覆滿清政權是在中法越南戰爭（1885）時，

然而若以他投身革命運動起算，應以 1894 年在檀香山成立革命組織興中會為合。

無庸質疑孫中山民族革命思想乃源自洪、楊：孫中山年幼家貧，髫齡時即在家中助理農作，常聞鄉人談論洪、楊故事，即以「洪秀全第二」自許（李劍農，《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冊》），並認為洪秀全起自布衣，驅逐異族，故不能以成敗論英雄，因而深慕其人（李旭飛，《洪楊革命與國父革命之比較研究》）。莊政先生也說：「他從老兵的談話中，探本尋源，對明清兩代之間遞嬗的史實了解甚深，是時在腦海裡蘊育了排滿興漢的種籽」（莊政，《國父生平與志業》）。從興中會的人會誓詞「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，創立合眾政府」便可知孫中山的革命觀，由開始已經具有民族主義精神，而這種民族革命思想而且是承襲自「洪楊革命」而來。

特別指出的，是孫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並非獨指推翻滿洲人統治，它還包括針對當時西方殖民國家對中國經濟壓迫所提出的抵禦外侮、爭取恢復在領土上行使完整主權，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理想，這是後來「五四運動」外爭國權口號的根源。

至於民生方面，平均地權、節制資本是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兩大主旨，它的內容包含中國傳統經濟觀及西方經濟思想：中國歷來有「重農貴粟」的精神，所謂重農，是指耕田的人都能得到耕地，而不致「貧

無立錐」，所以要限制土地，不致集中於少數人手裡，「限田」及「分家析產」制度便悠然產生（羅香林，《中國民族史》），這一觀念與孫中山的「平均」理論互相呼應；節制資本是以限制私人資本，發達國家資本兩大原則來發展實業，增加生產，謀取分配平均，提高國民物質生活，建立全民衣食住行育樂並進之安和樂利大同社會，這又與西方源於 18 世紀的社會主義所提出的公有、平等原則如出一轍。

孫中山民生主義揉合中、西思想一爐而共冶，它不是孫中山於革命開始時便生成，是他在 1896 年第一次起義失敗流亡倫敦，經倫敦蒙難脫險後，每天到大英博物館看書，研究革命方略和理論所發展出來。從 1905 年同盟會入會誓言包含平均地權足可證明，縱然關於民生的革命思想並非直接繼承「洪楊革命」「天朝田畝制度」，但是民生主義的「平均」及「博愛」觀念與「天朝田畝制度」的均田及平等理想不謀而合，故稱得上是「洪楊革命」理論的繼承者。

中國自秦朝（221 BC-207 BC）以來，實行君主集權制，它有別於西周（1046 BC-771 BC）封建時期的分權制度，皇帝擁有至高無常權力，平民百姓對政府的施政沒有參與權，因此漸漸走上了專制政體。及至滿洲人統治，初期實行高壓政策，在種族問題上採用分化及隔離手段使其降服；經過康（熙）、雍（正）、乾（隆）三朝（1661-1796）對外擴張，隨著疆域擴大，腐敗政治逐漸侵蝕清帝國，然而君主專制

程度有增無減。19 世紀下半期，清帝國飽受西方列國欺壓至國土險被瓜分，有識之士倡導變革圖強卻被專制政權所壓制。

其時在歐洲的另一方，從 17、18 世紀已經出現主權在民、讚美自由，批評專制、甚至主張可用武力推翻腐敗的民主理念。英國光榮革命（1688）、美國獨立運動（1776）、及法國大革命（1789）等民權革命就是在這樣環境下產生。孫中山吸收了這些民主思想，放在他的革命理論中，這些是早年反清革命人士，包括天地會及太平軍所沒有。孫中山是中國推動民權思想的首創者，也是使中國實現民主政體的第一人。

「辛亥革命」思想開啟後來民初的社會運動及後期的共產革命。20 世紀中國的歷史，是一部改革與革命的歷史，「五四新文化運動」以「科學」（理性）和「民主」（人權）為整個運動的題旨（連浩鏐，《改革開放的歷程》），它與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不是沒有關聯的。用理性來思考正是孫中山「三民主義」形成的關鍵，他針對中國當時身處之環境，參考西方先進理論，溶合中國固有文化，提出改革社會、政治、及經濟，完全乃透過理性分析而得者；人權更是孫中山民權主義的內涵；而且在五四學生運動中，學生們在罷課及遊行時高舉的「外爭國權」口號，與孫中山民族學說反帝國主義論精神一致，因此這場新文化運動實在是孫中山學說之延續。

「辛亥革命」的民族革命觀鼓勵了很多亞洲殖民地走上反帝國主義的道路，20 世紀初是「亞洲覺醒的時代」，「辛亥革命」就是這個「覺醒」中開始的第一次。越南、印尼、和其後的土耳其、印度等都被中國革命所鼓舞。不但如此，就算毛澤東的共產革命，都視孫中山「辛亥革命」為其起點。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提出「新民主主義」建國理論，指「五四運動」是中國「新民主主義」革命的開始，之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，中共取得政權前的這一段時期稱為「新民主主義」革命時期。上述指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是孫中山的革命運動，足證中共的革命與孫中山的革命是一脈相承。2016 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孫中山誕辰 150 周年紀念大會上，其講話中也強調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革命事業「最堅定的支持者、最忠誠的合作者、最忠實的繼承者」。

5. 洪楊與孫中山兩革命之意義

「革命」是要推翻建制、打破條框，以達到建構嶄新制度、樹立新範式之目的；「改革」是在維護建制的大前提下，力求建制更趨完善。（連浩鏐，《改革開放的歷程》）。由於革命予人激進感覺，因此革命者需要在革命之餘還應增添針對現實的制度改革方案，以爭取社會大眾支持。「洪楊革命」及「辛亥革命」的領導者都有這種動機，洪、楊的民族及民生改革思想；孫中山的民族、民生及民權思想

便是明證。其實民族思想是社會變革；民生思想是經濟變革；民權思想是政治變革。洪、楊的民族思想繼承清初天地會革命思想，再增添民生思想，革命雖然失敗，但精神流傳下來，至孫中山承接，再添上民權思想，雖然革命成功，部分民族思想得以實現，但民生及民權兩改革尚未得到充分落實，所以有後來的「五四運動」及共產革命。上述承傳過程，除可看到「洪楊革命」及「辛亥革命」的承先啟後作用，還可看到每次革命思想都在完善及強化，這就是推動人類文明的過程，亦是兩場革命的歷史意義。

6. 結論

歷史事件每有其因果關係，事件與事件之間總會有關聯，而且彼此的關聯又凸顯出個別事件的重要性。本文嘗試用承先啟後方法分析歷史事件的意義，就是在這種特點下設想的，藉此希望能對歷史事件有更深層之研討。而且亦希望日後能夠將「承先啟後分析」法應用到其它歷史事件中。